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内部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二月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32,000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11072·44

定价：0.58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

..... 张国忱 (1)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 罗增寰 (21)

“七七”事变前天津便衣队暴乱真相..... 辛公显 (33)

宋哲元与冀察政权..... 齐协民 (51)

我所知道的日寇策划冀察、山东独立的

阴谋活动片断..... 王仕任 (61)

伪满铁石部队进犯冀东解放区的罪恶活动

..... 刘德溥 (69)

孙传芳的一生..... 杨文恺 (80)

孙传芳被刺纪实..... 张达骧 (97)

山东孟家与瑞蚨祥..... 刘越千 (100)

元隆绸布店与“庆修堂孙”的兴衰始末... 孙敬之 (118)

“胜芳蔡”发家史..... 蔡慕韩 (130)

✓天主教传入天津始末..... 赵永生 谢纪恩 (142)

✓基督教各派系传入天津概述..... 何凤德 (159)

✓俄国东正教传入天津前后..... 杜立昆 (176)

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 和中东铁路内幕

张 国 忱

-
- 一、中东铁路的沿革和霍尔瓦特的被驱逐
 - 二、一九二四年奉苏协定签订内幕
 - 三、一九二九年中苏冲突事件内幕
-

一九二四年五月，北京军阀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关于解决两国一切悬案原则的协定，建立邦交。其后，在奉天成立东三省交涉总署，负责对苏外交，我被任命为该署交际处长，兼总署首席参事和镇威上将军府咨议。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委任我为其秘书，后又发表为东三省交涉总署顾问和哈尔滨教育厅长。现凭回忆追写当时经历，惟年已八十二岁，难免有记忆欠详之处，望知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一、中东铁路的沿革和霍尔瓦特的被驱逐

从来帝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一个确定的基点，就是为俄国谋求出口海岸。彼得大帝占领芬兰湾，在西方开了一个窗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想在东方开一窗口。俄罗斯在东方只有海参威，但海参威冬季结冻，为时虽不长，也于作战不利，因

而想占领中国的大连港，所以十九世纪末叶沙俄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侵略，妄图瓜分中国。它特别注意利用修筑铁路作为它的侵略工具，尼古拉二世以一百二十万两贿赂李鸿章，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俄密约，从此攫取了修筑和经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路）的侵略特权。

沙皇派中将霍尔瓦特为铁路工程局长。这条路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分路到达海参威和大连。铁路修成后，沙俄侵占满洲的野心为日本所不容，于是引起日俄战争。战后，中东路自长春到大连，所谓南满一大段，整个让给日本。我们现在谈的是以哈尔滨为中心，即东到绥芬（东线），北到满洲里（北线），南到长春（南线），这就是当时我们所说的中东路。

铁路筑成后，原工程局长霍尔瓦特成为中东路管理局长。那时中东铁路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是理事会，设在莫斯科，在中国只设铁路局局长。一九一六年沙皇曾派其财政大臣威德到哈尔滨视察，同时传达沙皇旨意，授权霍尔瓦特为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从此，霍尔瓦特在哈尔滨俨然以殖民地总督的角色作威作福。

中东铁路理事会下设办公厅，主任为中将柯罗勃夫和外交顾问克列姆，民政厅由中将阿发那谢夫负责，军部由沙莫依洛夫负责，市政局按期选举市长（铁路范围区内），公用局管辖自来水、电灯电话，文化部下设俱乐部、剧团、音乐厅、水上俱乐部、冰场、教堂等，还有文物研究会和气象台。以上机构全由俄国人掌握，另外理事会还设督办公署，是中国方面的空衙门，无事可作，办事人员也大部不懂俄文，只是看管着中东路每年净利中分给中国的那一部份。

霍尔瓦特任理事会理事长以后，铁路局长由工程师拉琴诺

夫代替，铁路局内设秘书、人事、机务、车务、工务、学务等处。

霍尔瓦特原系皇室贵族，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对革命政权极端仇视，于是在中东路沿线对苏联政府宣布独立，并率领所部，窜入海参威，组织反革命临时政府，自任全俄政府总裁，理事会各部成员也都变成临时政府成员。但当时在海参威，革命党的力量也在活动，广大人民也是反对霍尔瓦特的。一天当霍尔瓦特乘汽车在靠海边的明亮大街通过时，一颗手榴弹击中了第一辆车，炸死了和他长得一样、胡子也一样长的哥哥，霍尔瓦特吓破了胆，急忙跑回哈尔滨。那时我正住在他家里当家庭教师。

在霍尔瓦特潜入海参威后，哈尔滨各方面都在注视着中东路将如何发展。中国政府准备接收，债权国法国也想染指，以便扣还借款，至于苏联，虽然是革命政府了，但仍然准备重回中东路。因此，在霍尔瓦特走后，中国马上派高士侯到哈尔滨去接收。^①

关于中东路问题，北京政府派总统府三位外籍高级顾问到哈尔滨视察，协商解决，有美国的福开森、英国的辛伯森和法国的巴德鲁。他们熟悉中国情况，都讲一口漂亮的中国话，结果决定由法亚银行以债权国理由，接收中东路，派俄人沃斯特

^①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曾企图攫取中东路权益，实行国际共管，美、日两国并曾派兵驻扎于中东路沿线，彼此间展开激烈争夺。北京政府当时亦企图否认苏联对中东路铁路的权益，进行了有名无实的接管。为此，苏联政府曾一再声明，中东路系俄国投资的企业，应由中苏两国平等管理，并表示放弃沙皇政府过去在该铁路上一切特权，还表示在一定时期后该铁路即可由中国赎回。在当时，这种主张还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的。

罗乌木夫为中东路局长。中东路的最高行政机构——理事会由中国兼管，另组织督办公署，经北京和奉天方面协商由宋小濂为督办。原理事会下设法院、警察管理处、检察院、路警处、土地局、教育局等，都由中国接收。

至于霍尔瓦特，则由北京通知，经张作霖同意，限三日内离开哈尔滨，不准再回中东路。北京政府在东交民巷原奥国使馆旧址为其觅妥住处，并将他在哈尔滨时住的将军府庄园送给他。离开哈尔滨时，同意他带走秘书长和外交官，由我陪他到北京。

二、一九二四年奉苏协定签订内幕

一九一九年七月，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的用意，固然想废除帝俄时代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另一目的也还是想借中国的力量消灭远东的白俄势力，特别是中东路是白俄的盘据中心，而苏联政府一时对远东尚无暇顾及。但当时北京政府与协约国采取一致行动，不承认苏联新政府为合法政府，所以对宣言始终置之不理。

一九二〇年四月，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大体上还是着重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但对中东路的处理，已不像第一次宣言中所说一概无条件交还中国，却提出中东路由两国共管。这是因为这时远东白匪势力已逐渐被消灭，苏联政府渐趋稳定，对中东铁路则无放弃的表示了。

苏联就此问题和北京政府进行交涉。但只和北京政府交涉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军阀割据时代，中东铁路属于张作霖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必须通过张作霖。于是苏联人找到当时包办

张作霖对俄外交的杨卓。

一九二四年奉苏谈判之前，正是张作霖充实军备、准备进关、以武力夺取北京政府宝座的时候。张鉴于冯玉祥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军事上是他打天下的一大障碍，便借中东路谈判问题要挟苏联以不帮助冯玉祥为先决条件，并提出在中国境内不准宣传赤化以及华商卢布赔偿问题，还有铁路用人中俄对等和中俄文字并用等问题。苏联方面谈判代表库滋涅佐夫对要求不援助冯玉祥问题，认为可以答应，但是不能写在文字上，并表示说话一定算数，对其他问题也都一口答应在协定签字后四个月内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解决。张作霖看到要求停止援冯的目的已经达到，利令智昏，对于铁路权益问题并未仔细考虑，就糊里糊涂地签了字。

签字后，苏联很快地接收了中东路，对其他事则不闻不问。张作霖在此期间积极准备参加小组委员会的人选，和一些必要的其他准备，屡次催促苏方根据奉苏协定召开小组委员会。但到此时，加拉罕和库滋涅佐夫对什么卢布赔偿、停止援冯、及时召开小组委员会等全都不认账了。张作霖此时开始对杨卓起了怀疑，他想到杨卓自从当上中东路监事后，终日穿着将军服，自称杨将军，到处招摇撞骗，曾有好多人写信来反映；又想到对俄外交方面的人，多是与杨宇霆有关，或是经他推荐而来，如签字后成立的东三省交涉总总署长钟世铭、签字代表郑谦、俄文科长张裕恒等，都是杨宇霆推荐的；杨卓是张裕恒介绍而来，交涉总署交际处长潘文中是钟世铭的女婿，而杨卓的一切活动大部又是通过杨宇霆向张作霖转达。蛛丝马迹，一团疑雾，乃决定派人去暗中调查，才明白自己受了骗。

自从一九二〇年我送霍尔瓦特到北京后，正好在北京饭店

碰到李嘉鏊（一九一一年我考取清政府官费留俄，去哈尔滨学习，李以哈尔滨兵部道尹兼任留学生监督。当时，名为留俄，实际上就在哈尔滨学俄文），他当时为北京俄文专修馆督办，动员我去教书。我到俄文专修馆以后，从莫斯科介绍来一位教师，叫潘可拉多夫。不久，李嘉鏊被派到芬兰任公使。李走后，学校组织评议委员会代行督办职务，我和潘可夫（简称）都是委员，他时常给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我也从未干涉，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我的少年时期好友王仲甫（张作霖英文秘书）、祁彦树（张作霖教育厅长）不断从奉天来信，催我回东北工作。当时我并未介意，后来我才明白，当张作霖对杨卓产生怀疑后，意识到在对苏外交方面，必须找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故找到王仲甫和祁彦树（都是东北人），要他们推荐人才。不久，祁彦树等连寄快信说：“大帅要你赶紧回来，担任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长。”临行时，潘可夫夫妇为我们夫妇饯行，盛情难却，只好应承。我们夫妇赴宴时，只见宴席准备非常丰富，有北京很难买到的黑鱼子，一色别致的俄式大菜，还有法国名酒，我深感主人殷勤款待之情。席间我们尽情畅饮，很是高兴。宴后，潘可夫说：“请太太们再坐坐，咱们到卧室里，再吃杯蜜酒。”因为俄国风俗，宴会后要喝少量蜜酒，我也不以为怪。酒后，潘可夫说：“加拉罕大使曾找我，要我告诉你，张国忱此次如回东北，在奉苏外交问题上，只求不予作梗，每月补助一千美金（当时等于二千六百元）。”我听后，吓了一跳。潘可夫连问我“怎么样？”我说：“今天酒喝的不少，我暂时还不走，走前我一定答复你，我得考虑考虑。”回去后，连夜收拾行李，次日提前动身回到东北。

到奉天后，东三省交涉总署署长高清和送来委任，并加委

为东三省交涉总署首席参事和镇威上将军府咨议。我问高署长何时谢委？因为按例都由上司带去谢委，这次出乎意料，高说：“你自己去谢委吧！老将可能有话说。”次日进府，到时，先由门岗送我到承启官处，这个承启官是个粗人，人称李麻子，见我便问：“你是张处长？大帅在等你。”随即带我进去，边走边问我：“是头一次见大帅吗？这是个有分寸的地方，小心你的脑袋，青年人要当心，别来歪的斜的。”说着，穿过走廊到西院，进山洞有张作霖亲笔写的“天理人心”四个大字，走出山洞，见三层楼房，台阶上下有便衣当差，说：“大帅等着呐！进去往右一直走。”走进一看，室中有一真虎标本，我想这大概就是老虎厅吧！抬头看见张作霖，身穿旧兰布夹袄，拿着小烟袋，站在窗旁。我连忙行礼，报名，并说：“我来谢委。”张作霖说：“我不是叫你来谢委，告诉你，我叫人骗了，你是家乡的孩子，我不拿你当外人，那帮混账王八蛋，全叫我给赶跑了，我制不了外国人，还制不了中国人？以后，有关中俄的事，由你完全负责，中俄电报你要负责保存起来，所以没叫你们署长和你一块来，多年来，我对你有了解。”说着又小声说：“加拉罕一直要来，我没见他，他可能还要来，这次我要见他。”并指示我要为加拉罕来奉积极作好准备，研究好对策。

这次我在来奉前，曾电约哈尔滨的邹尚友来奉，我介绍他就任条约处长。他见我就问：“军法处枪毙杨卓的事，你知道不？这回他至少捞了一百多万。”随后，他便把杨卓案件对我讲明，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张作霖说“自己受骗了”……等话的意思，也明白了承启处李麻子为什么说“小心脑袋”这句话的含意。

在加拉罕来奉前，交涉总署为此作了研究，署长高清和、条约处长邹尚友、政务处长陈某和我一致认为：这回决不能再有丝毫失当之处，坚持不准宣传赤化这个原则，东三省领导要统一口径，必须听老师指挥，千万不能叫加拉罕找出空隙，不能再叫他欺骗收买，要作好一切准备。大家研究后，乃向张作霖汇报，他说：“好极了，咱们最后一张牌就是不准宣传赤化，我和吉、黑两督军取得一致，决不能被他骗了，哈尔滨行政长官张焕相也没问题，俄国人提出的问题全是不满张焕相的事，他们想给中东路职工会启封，这绝对不行，我们绝对不准宣传赤化。加拉罕这次来还要求释放张焕相逮捕的人犯，陈克正（哈尔滨法院院长）、张贵良（警察处长）和张厚琬（路警处长）都是铁面无私，他收买不了，我想得和你们一样，今后外交的步骤就这样确定，就这么办。”

不到两天，苏联驻奉天代表加维·库滋涅佐夫通知交涉总署说：加拉罕大使某日来奉，张作霖说：“我准备迎接，次日请来午餐。”又命我约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吉林督军张作相二人作陪，并嘱我们要精心安排。至时，加拉罕由库滋涅佐夫陪同，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加拉罕等坐在大沙发上，张作霖坐在单人沙发，我和高清和坐在旁边，由我担任翻译。他们先谈了天气和一些不相干的事，寒暄一番后，即到老虎厅旁的大饭厅举行宴会。宴会时，张、吴二将军参加。上的菜无非是名贵的松江白鱼、燕窝、银耳和各种名酒，饭后，又回到老虎厅。

张作霖说：“问问大使这次来有什么事？”

加拉罕说：“我来过几次电报，都为张焕相的事，职工会至今没启封，还有人陆续被捕（列举件数），这样发展下去很不好！”

张说：“你还来问我，我还要问你呢？不宣传赤化是条文上写明的，可你们职工会就是宣传赤化的大本营，苏联职工来的目的就是宣传赤化？协定签字了，全不算了，你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全是混蛋？不犯法能逮捕吗？你还来问我？不帮助冯玉祥的事，你们说只能在口头上说，不能写在条文上，结果也是没办，帮助冯玉祥不就是打我吗？当年最早到中国的鲍罗廷、加伦，那是我介绍他们认识孙中山的，那时对俄国有好感，今天把我都忘了。不宣传赤化已写在条文上，你们说话不算，我就不给启封，而且还要陆续查封，答应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你们的好处，别以为你们能收买，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惹急了，我把他妈的铁路全给崩了！”说着把手里拿着的烟袋，用力一摔，激动地说：“妈的，你们还讲理不？什么东西！”说完拿起烟袋，转身走了。我心想这事不好办，加拉罕每天学习两小时中文，张作霖说的这些话，不用翻，他看神气、听口气也听得出来。这时我和高清和、加拉罕以及库滋涅佐夫都保持沉默，以为张作霖走了，过一会会回来，谁知等了十分钟，也没回来。我想这可说什么好呢？便仍一动不动，后来库滋涅佐夫说：“咱们走吧！”加拉罕才站起来和库滋涅佐夫一起走了。张作霖也没送，只由我和高清和送到大门外。

不久库滋涅佐夫自知没法干下去了，请求办理回国护照。苏联驻奉天的办事处，成了无人负责的办事处，以后再也没派人来。

加拉罕回到北京后，积极筹谋对策。他找到北京中俄交涉总署的王正廷，要王帮助他缓和奉张对他的态度，王于是派总务处长祁大鹏、会务处长裘芬龄来奉找高清和疏通。他们想把东三省交涉总署的高清和拉拢过去，并发表高清和为中俄交涉

总署会办，给了两万元。王正廷以为事已办好（不想错找了拉拢对象），决定亲自来奉见张，随行有裘芬龄。到奉后，既没见到杨宇霆，也没见到张作霖，高清和也不敢出面应承。王正廷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临走时，高清和叫我去送，我见到王时，佯作不知，问他：“您见到大帅吗？谈得很好吗？”他说：“那里见到了，我带来两坛绍兴酒，还得原封不动带回去。”

加拉罕认为高清和已当上北京中俄交涉总署会办，两万块钱也已收下，因此他因公赴哈尔滨时，事先命苏驻奉领事馆通知东三省交涉总署，加拉罕于某日过境，意思是与高清和接触，进行试探，没想到路过奉天时，只有我到车站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不久，加拉罕自哈尔滨回到北京，给张作霖拍了电报，措词强硬，主要是要求撤换哈尔滨行政长官张焕相。张作霖看后，一点也没发火，只说：“这回可好了！”说完叫我看电报，我当即明白他的意思，这不仅是宣传赤化，还是干涉内政。张作霖问我：“能撵走吗？找外国顾问研究研究，看看根据国际法怎样撵他。他宣传赤化，干涉内政，不得人心。”我和白俄顾问一研究，确有先例可循，两三年前，阿尔巴尼亚就把苏俄大使驱逐回国，所以决定先用口头声明，如不接受，再正式行文。口头声明大致如下：东三省交涉总署奉命宣布，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宣传赤化，干涉内政，行为恶劣，不得人心，请予撤换云云。声明发出后，一面用东三省交涉总署名义，正式通知北京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一面派我到京，找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请他通知莫斯科。

在此期间，苏驻奉办事处忽然来人，手持照会，声称要见

总署长，有重要事情商议。高清和认为办事处久已无人负责（因库滋涅佐夫已走），不知何事，便也要我参加会见。来人声称：关于东三省交涉总署发表的口头声明，表示对加拉罕大使不信任事，苏方认为这不是交涉总署的意见，也不是张作霖的办法，完全是交涉总署交际处长张国忱一手制造，希望你们收回声明，并对张予以处理。高清和表示，这是我们的内政，苏方无权干涉，不能受理此照，以后为此事希望别再来等语。此人走后，张作霖决定不客气，用外交方式解决，于是派我到北京找王荫泰，要其发出正式外交文件，措词和口头声明大致相似，只是又加上：“如不撤换，奉军进京后，对该大使不负保护责任。”

莫斯科听到奉张驱逐加拉罕的消息后，派克拉勃维斯基来奉商谈。克拉勃维斯基扬言能挽回大局，有解决办法。张作霖听说后，嘱我不妨谈谈，只要不宣传赤化，军事合作也可以研究，但不要告诉杨宇霆。我和他谈了几次，克拉勃维斯基就双方开展军事合作问题，请示莫斯科，回电云：军事协作要派军事人员来研究，克拉勃维斯基不能谈判。张作霖一听就火了，说：“又来这一套啦！”谈判遂搁置。不久莫斯科又派交通部副部长谢列不利亚克夫来奉疏通，曾与张作霖会见，协议中东路问题。奉张方面提出：①缩减中东路管理局长权限；②路局职员应平均委用；③经济财政权委托董事会等三项要求。苏联方面提出的要求奉张撤销驱逐加拉罕的决定等八条苛刻条件都被奉方拒绝，会谈因之终止。谢列不利亚克夫和克拉勃维斯基遂一道悄悄回国。

张作霖对加拉罕恶感很深，决心驱逐他。由于当时奉系已打败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外交部不能不听从他，乃令驻苏代

办郑延禧正式向苏联外交部提出召回加拉罕的要求。很快郑延禧向外交部报告，苏联外交部的答复谓：“须俟中国正式政府成立后，方可交涉。”北京外交部见此，又电令郑延禧再向苏联政府催促，要求从速撤换加拉罕。苏政府无奈，只得命令加拉罕回国，加拉罕接令后，于一九二六年秋回国。

我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被调到张家口任外交部特派交涉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一九二七年四月，张的外交次长吴晋报告，苏联大使馆武官室有人企图颠覆奉张。张作霖获悉后即派警察总监陈兴亚迅速查明，结果查知确有中共党员李大钊等多人隐藏在內。实际这个情报是从法国公使馆传出来的。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各使馆里的仆役私下都有来往，法国使馆仆役从苏联使馆仆役那里得知后报告给法国公使，又通过法驻沈阳领事克里邦透露给吴晋的（吴曾在沈阳因向法国购买军火与克里邦熟识）。四月六日，张作霖派出军警发动了对苏驻华大使馆的搜查，逮捕了李大钊等多人，同时查获相当多的档案、书籍，各国文字都有。张作霖命陈兴亚迅速到各机关将凡属懂外文的人都调来，尽快译出。陈兴亚遂组织了编译委员会，正好原驻海参威总领事兼奉天代表王之相从海参威回来，陈遂请王为编译委员会主任。张作霖知道后，不大满意地说：“打电报把张国忱找来，叫他星夜兼程来京。”在搜查后的第三天，我急忙从张家口赶来，到京后，立即晋见张作霖，他在斗纸牌（张作霖素爱斗天津卫的纸牌），看见我，放下纸牌说：“俄国大使馆叫我搜查了，东西全在警察厅，他们组织个编译会，我不信任他们，你去吧！由你当会长。”又说：“文件、档案什么都有，要造底册，每天译出的东西，要油印出来，给我送

十份。叫他们给你发个红车牌，随时可以进新华门。”

过了十几天，张作霖又找我说：“这些天翻出来的东西没多大意思，没有向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要注意查找，这样可以激起国际上的注意。”我回去后心想，翻了这么多日子，哪有啊？译员中有外国记者，我找了一个老白俄，是哈尔滨《喇叭报》记者，我叫他假造一份向国际宣传赤化的材料，由王之相译出，给张作霖送去阅看。搜查苏联大使馆的这一件公案就算告一段落。

三、一九二九年中苏冲突事件内幕

张作霖对我是很信任的，前面讲过，从奉苏协定到一系列的中苏交涉，都对我委以重任。现在再例举几事说明：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是个相当于财政部次长的肥缺，自胡若愚被撤换后，有许多人竞争，结果刘焕文秘书通知说：“阁议通过，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由张国忱担任。”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再如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时，要读誓词，誓词由谁递给他呢？负责筹备就职典礼的人，提出几个人，由其挑选，都不同意，最后提到我，他才点点头。

万没想到，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对我宛如晴天霹雳。老师信任我，少帅呢？这问题一直在我脑中萦回。

张作霖死了，我不能留在北京，必须回奉天去。临行前，我决定将税务监督所存现款二十三万五千三百元带走，同时给一位税务监督署内的老处长留下一个条子，上写“我要走了，职务由你代理，二十三万五千三百元我带走了，此款如何处

理，我将在报上说明，与你无关”等语。我同张学良虽然也很熟，但不如其父对我的了解，他有他的一帮人，我决定回去后，把这笔钱交给他，作为进见的政治资本。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我已备好呈文，将二十三万五千三百元支票如数呈缴。第三天，张学良批下条子，我即将批条寄给北京《顺天时报》和《益世报》发表。后来张学良见人就说：

“他妈的！回奉天以后，都跟我要钱，只有张国忱给我送钱。”从此，对我另眼看待。张学良回奉天后，第一个条子委了六个秘书，其中有我；第二个条子又委了六个人，要求给他组织新党，以便和国民党合作，这六个人是翟文选、王树翰、刘哲、彭济群、张国忱、冯庸。其中刘哲很不一般，他当过张作霖的教育总长，背后有杨宇霆撑腰，很难驾驭。这个组党名单下来后，我和彭济群找他去，认为少帅既下了条子，咱们几个人开个会研究研究。刘哲说不开，就开不起来。张学良又下条子，叫我去接收哈尔滨工大，因刘是教育总长，我去找他，刘说：

“我这个教育总长还没辞，你接谁？”结果又将条子送回。张学良总想给我安置一个好的位置，不想总是遇到阻力。不久中苏长途电话哈尔滨——伯力通话，要和最高首长说话，张学良派我代表副司令应话。然后，张学良又派我去查办张焕相，意思是要我接替张焕相。杨宇霆一听，忙说不行，青年人当了长官还行，于是不等我到哈尔滨，杨宇霆迅速发表张景惠为行政长官，后来接到奉天来电谓：哈尔滨行政长官已决定为张景惠，你当教育厅长，同时兼任东三省交涉总署顾问。

自张作霖死后，东北的元老派和青年派矛盾重重，同床异梦。就是元老之间，表面上唯唯诺诺，转身就各作打算。至于青年派之间和新旧军人之间，也都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极